

●江浩对文学界的震撼,被称作是“北方大漠卷来的狂飙”。这个从“逃学儿”、“盗马贼”蜕变成文学骄子,同时是集作家、编剧、导演于一身的奇男儿,被外国评论家称为“站在魔鬼与天才之间的人”。

江



人·物·传·记·卷

浩

文集

4

●一部充盈着血性、雄性和人性间阳刚之美的作品

●第一卷为纪实文学卷,共收入《昭示:中国慰安妇》、《穿越铁幕——一个中国人在以色列》、《在北美的困惑与焦灼——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见闻录》、《塔尔寺:牢骚与虔诚的归来》四部作品。

●第二卷为长篇小说卷,共收入《盐柱》、《他从古墓中来》、《倾斜》三部作品。

●第三卷为中短篇小说卷,共收入《北方的四徒》、《雪狼和他的恋人》、《猎场扎撒》、《冷酷的额伦索克雪谷》、《是马就有三分龙气》、《都冷桑阿爸和他的梨花鹰》、《废墟里的轶事》、《扎鲁特草原的三骑手》、《哀歌》、《老枪》、《圆寂》、《空祭》十二部作品。

●第四卷为人物传记卷,壮写第五代导演:

何群——《现代的供祭》、

侯咏——《终极的孤寂》、

吴子牛——《嗜血的王图》、

姚云——《白色的苍生》、

胡贝贝——《废墟的祈祷》五部作品。

●华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4 号

江浩文集

作 者: 江 浩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发 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0 电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76 千字
印 张: 67. 25
版 次: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7000

书 号: ISBN7—80039—954—0/I·536

定 价: 82.00 元 (全 4 卷)

(书中如有缺页, 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目 录

何 群：	现代的供祭	(1)
侯 咏：	终极的孤寂	(92)
吴子牛：	嗜血的王国	(183)
姚 云：	白色的苍生	(290)
胡贝贝：	废墟的祈祷	(381)
江 浩：	站在魔鬼与天才之间的人〔法国〕 西蒙	(467)

何 群：现代的供祭

用全部的生命装饰世界，直到两手空空，才明白人间没有回赠公式。

——作者提示

何群，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曾任《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大阅兵》、《寡妇村》、《书剑恩仇记》等影片的美术师。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关于〈一个和八个〉的美术探求》、《在〈黄土地〉上寻找民族文化的积淀层》、《娱乐与探索：扪心自问》等论文；一九八八年独立执导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哗变》；一九八九年调入珠江电影制片公司任导演，同年完成故事片《西行囚车》。

原始人慑于大自然的神秘和恐怖，于是产生了迄今让现代人思维不断腐蚀和探究的祭台；而原始部落的自身膨胀和萎缩的巨大谜语，蕴育出对生殖的崇敬及塑刻成图腾的日夜膜拜。祭品的双重身份便诞生出来；既是人的寄托，又是神的出现。人类开始低下刚刚抬起的头颅，双膝再次弯向告别不久的大地。当人类献上祭品的同时，便把自己的未来与命运依附之上。

于是，人和神的情感沟通与信息传递，便由中介物——祭品

在一个含糊不清的谒语中完成。那时，祭品带着人类的庄严，救世主般地在众目仰视下去等待诸神。也是从那时起，人类萌发了为自己的生存而将他人供祭的意识。

祭品的形式和内容，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地演变，等到落实到在中国电影史上必将留名的何群身上时，只剩下装饰与遗弃。他的全部给予和付出，充其量就是给陈凯歌和张艺谋的人生脸谱着色；待第五代的精英被近似弱智的评论家所赠的一元钱三千多公斤的处理鲜花掩埋得窒息腐烂后，何群便也彻底地完成了辉煌的使命。如油彩被人理所当然地洗尽溶于分文不值的水中，尽管现在水大于血，他也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剩余价值。第五代的精英们利用电影是综合性艺术这一钢浇铁铸的法则，进行着“创业靠集体，出名是个体”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般的大规模的试验。而中国各个报刊的有名的和无名的与正要借此出名的记者，则自觉和不知不觉地充当了大面积的瓦斯，在毒害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成了第五代精英们的廉价殉葬品。

中国从此进入当代电影由第五代导演写成的误区。艺术的物价便被几个人哄抬到令天才和蠢驴都无言以对的地步。电影的胶片从厕所的便池里直接洗出来，甚至连冲洗一下的时间也没，便直接送往世界上一切角落，去换取我们亟需的各种镀金或镶痰的奖品。中国电影史的内文，开始出现倒装、错页、或连续空白的现象。

何群，在他选择了电影的同时，电影史便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现在，我们正在时代的威逼下去大踏步地向权威人物的神坛逼近，震惊我们的佐证不断地被披露出来，调侃着我们的忠诚与膜拜。在西欧，几个流氓医生自费从枫丹白露的诊所搬出发霉的病历卡后，世界所有的新闻媒介在同一天报道了：高更、塞尚系白内障。他们的独特的感觉和独特的风格，与他们的追求无关，而

是一种病态的正常反应。由此，我们悲惨地得出一个结论：疾病成全了一个世界，创造了一段人类文化。同时，另一个注定要被活剐的科学家证明：人类的起源不像赫胥黎等人说的那么伟大，而是一只腿上有残疾的猿演变进化的。我们现在才明白，历史和权威在狼狈为奸地调戏我们；我们必须忍受这种调戏。人类只有在面对调戏时才能创造出有益于生命的精神果实。

何群，永远面对着被调戏与被供祭的命运。

一九七八年，被共和国积压十几年的人才，突然像马铃薯似的大面积地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翻冒出来；大学的金字招牌再一次洗刷掉污浊，重新公平而又多情地向一切有志者显露着均等的机会。那时，不论是思想上残疾的中年还是灵魂上残废的青年，在一个早晨同时出现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尽管他们站了十年，但终于等到时代这位失踪的发令员举起了枪。此时，来自北京近郊“中阿人民友好公社生产大队”这个现在听起来让人啼笑皆非的单位的何群，也雄心勃勃地挤在起跑线的最外缘。

他的目标不算高——北京电影学院。

当然此时和他并肩的还有在日后注定要认识并成为朋友的田壮壮、张艺谋、吴子牛、侯咏、金韬、陈凯歌等。但是现在，客观地说全成了竞争者，每个人心中都盛满排斥心理。北京电影学院毕竟不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收容所，起码它要找到一些天才，然后通过四年的强化教育，最后送到中国各个电影制片厂，直到把中国三十多万从影人员弄得倾家荡产才算彻底完成教学大纲任务，由此向全世界来证实北京电影学院具有非凡的点金成石的本领。

但是，由于十年的禁锢，思维迟钝，导致一九七八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在录取新生的名单中删掉两个名字：何群与张艺谋。

两个天皇巨星般的名字。

今天的事实无须任何狡辩与搪塞。如果没有何群的精工细作，

没有他的竭尽全力的创作，《一个和八个》的震撼艺术界的造型语言，将仍如以往的影片一样在群众视野中搭漏各种花纹的尿布子；而《黄土地》的颜色恐怕会和过了期的大便一样，近视的评论家无论用多大倍数的显微镜恐怕也难从中寻找到什么新的美学价值；这些对于他来说，也许是一种向往的追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何群与他的合作者在民众欣赏处于饥渴的时期，把中国电影的制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不容否认的，但也是迄今没有人承认的。从那时起，我们这代人才迷上电影；我们也不得不为曾经崇拜过的导演伤心难过，并象和欺骗了自己的情人一刀两断地分手一样，把北京啤酒往马路当中一摔，大喊一声：谢晋，玩勺去！于是我们走向猎场，走向黄土地，在盗马贼的世界寻找现代人的精神支柱。从干枯的老井里窥视祖宗们的猥亵；当我们在高粱地里看到风化成石的奶奶和爷爷做爱遗下的精液时，才明白整个民族的生命便是这么偷偷摸摸形成的；但我们羡慕他们赤裸裸的性欲，因为我们被他人阉割成了只有想法而无行动的生物标本。

何群伙同他的合作者完成了一次中国电影史上的政变；给两代人建立起一个新的电影王国。尽管这个王国在喧嚣中霸世四年，便随着旧式避孕套扔进道旁的垃圾箱，人们不会再想起它来；但历史会记着当年有那么几个青年让十亿中国人看到：世界上还有一批这样的电影。同时，这批电影也成了弱智影评家养家糊口唯一的经济来源，这是何群他们始料不及的，客观上就像救济灾民，上至八十六岁下到十一岁，一律安抚了一把；当然包括他们自己的虚荣心。

一九七八年，何群与艾卫卫（艾青的儿子）、华方方（华君武的儿子），还有一个他迄今不愿说出名字的朋友，摹仿着当时唯一知道也是唯一崇拜的安东尼奥尼的气质，坐在考试桌旁，梦想有一天成为电影王国里的巴顿；当然也大胆地梦想着日后美女云集

的生活。电影是当代世界和佳人靠得最近的一门学问。要想学好电影首先得学完女人这一课。八年后，何群在给我的信中说：电影是由无数漂亮的女人组成的。我给他的回信是：爱情是人家的，身体是自己的。

何群的安东尼奥尼式的气质还没发挥到被父亲当陌生人撵出家门，北京电影学院捷足先登；一九七八年张榜公布的近百名未来的法斯宾达、贝托鲁奇、史提芬·史匹博尔格的名单中，没有何群。同样，也没有十年后成为国际影坛暴发户和领奖专业户的张艺谋。

这批新生里有注定让中国电影界五年后陷入困惑和不满的叛逆之徒：来自“第一世界”也就是电影世家的田壮壮、陈凯歌，来自“第三世界”也就是来自平民的吴子牛、金韬。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预知，未来的第五代中不能没有何群与张艺谋。

为此，何群跑到朱辛庄，在几滩刚拉的人屎上面找到“北京电影学院”牌子，狠狠踹了三脚，把自己的光荣与梦想留在了牌子和大便之间，打上行装，跟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写生小分队，开进长城下的石湾峪，梦想在这里变成高更，日后画作能在北美拍卖个上万美元。他这个年龄，是无节制生长幻想和奢望的年龄，也是靠着这些激素壮大自信心的；否则便像没有男人又不敢云找的寡妇，没等成熟便枯萎了。可是同时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的侯咏，在毕业时伙同张艺谋、萧风等人，把何群四年前踹过的学院牌子摘下来，放倒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用谣传的张艺谋卖血买的相机拍了一张照，借以向全体教师表示人类最伟大的尊重。这使人不得不想起，二次世界大战时沙漠之狐隆美尔追击巴顿时，一脚把巴顿车上的三颗星踢掉一对半，然后踩在脚下留张影的轶事，遗憾的是三十分钟后，那位摄影师连同他的照相机被自己的坦克烙了馅饼；而张艺谋和侯咏则要用自己的摄影机，在何群的配合下完成人生的诺曼底登陆。迄今侯咏还保存着这张说不清什么动

机的文史照片。

当何群用他那占尽眼科所有疾病的双眼，也像莫奈他们视力模糊地捕捉光在植物叶茎上的变化时，他被第一次但决不是最后一次地当成祭品供祭于中国高层领导人中间。中国的神坛上，终于接受了供祭的平民。不难想像此事给何群个人带来的心理压力，但也不可抹杀给一切没靠山的青年带来的海市蜃楼般的幻想。

在中国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权看的《大参考》上，赫然登出一封署名“何群”的上告信。现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无法提供这封信的原文，但我们可以把大概内容记载于此。标题是《电影学院美术系招生如此作弊》，信中列举了美术系主任葛未未利用职权给华君武的儿子华方方开后门的事实。信中又表白自己如何如何能考上，结果被他人挤下来云云。那时，刚刚揪出王张江姚，复出的老干部不仅带着对王张江姚的仇恨，还胸怀着重振雄风重树民风的愿望，新官上任三把火地燎烤没有知觉的民族身体。当然，人类的悲剧就是总有一部分人整另外一部分人。揪出王张江姚并不意味着这种悲剧的结束；而是把它的中间休息时间稍稍延长几分钟，挨整的多了点喘气机会，整人者多了点运筹时间。可是何群，怪就怪在无法确定角色，命运注定使他成为汉堡包中间的肉馅。而这汉堡包是用苞米面掺滑石粉做成的，中国的某些机关的抽屉里都放着别人送的或自己做的，以随时准备送给不顺眼的和顺眼的人。

这封信是直接寄给蔡若虹的，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蔡若虹当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根本与北京电影学院无任何干系；换句话说，如果寄给高教委或文化部，我们便没有必要像对待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在这里做徒劳的智力游戏了。后来这封信又莫名其妙地转给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邵宇。终于，邵宇把这封信转到我们前面说的正当归属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黄镇的写字台上。

何群的信在被人贩运到部长的写字台上时，他本人正坐在毕加索的画册上与一个白痴村姑调情。六年后，他硬说那是今生少见的美女。可据群众揭发，那个女孩色彩丰富的脸上长年流着两条富有曲线美的鼻涕。也许，从他看到两条鼻涕时起，他便构思出《大阅兵》经纬流畅的简练线条，以便陈凯歌和张艺谋能表现出人的能动机械性和动物的秩序性。但他不知道有一辆当时很奢侈的北京 212 吉普车正带着近似钦旨的使命朝他驶来，一种改变他命运的契机在文化部部长黄镇的写字台下的废纸篓里窥视着他。

此时，整个京城美术界为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何群而忙碌起来。何群立刻成了美术界的知名人士，世界上任何速成的程序都不及这次富有卓效。尽管他一夜之间达到别人梦想一辈子也达不到的地位，但人民大会堂的请柬永远也不会发到他的手中。何群的档案和考试卷以罕见的速度迅速从北京电影学院莫名其妙地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卷子将由这里的教师重新裁决。结果中央美院老师判的卷分比电影学院高出几个马头。议论的旋风骤然涌起，但任何人都不知何群属什么货色，凭着十几年政治斗争给予的敏感猜到里面肯定隐藏着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人们聪明地退出比赛场地或自动犯规被罚出场。但何群必须像祭台上的祭品一样，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没有任何权力移动一下位置，他的全部生命不再属于自己，自己也无权调动自己的意识。他必须像墨索里尼一样，当众悬挂街头任人与牲畜同时宰割。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赵玉，通过艾卫卫（现在美国）找到永远昏睡似的何群，与此同步，北京电影学院已经开学，时间：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二日。

一切知道内情的也对何群表示出难以叙说的责难。人们不明白，他的父亲便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虽说三生有幸被打成右派，而且被关进囚车押到祖国的大西北接受没有文化但有觉悟的人的改造；可当时确已平反，虽说没落实彻底，但还是能在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搞点后继有人的设计。但这位教授断然拒绝，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高尚但分文不值的清高。何群一九七七年报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的父亲袖手旁观，加上何群确实在文化与艺术上的不足，而被无情地逐出父辈的土地。但他没有怨恨父亲的清高，一头扎到发霉的文化中，如同杰克·伦敦的狼必须积蓄一定的力量，完成人生最后的一次起跳。十年后，当我为他写电影剧本《在劫难逃》时，他给我讲了大量父亲被押往大西北的惨状，并且安排了我与老人见面的机会。待影片完成后，他在没有征求我任何意见的情况下，断然把影片名字改成《西行囚车》。我想，这可能是他纪念父亲的一段不幸的符号吧。他多次祥林嫂般地向我重复父亲被押进西行囚车的情景，重复母亲的压抑的哭嚎。不论怎么说，中国两个与美术有关的高等学府的大门，先后朝他淫荡地一招手，随后“咣当”一声，便进屋搞起近亲繁殖来了。

而这时中央美术学院的赵玉，正在一间小屋里和何群会师。

何群日后和我说，考不上就算了，当时年龄还不大，还能考两三年。

但他迄今不明白，把他找到中央美术学院来干什么。接受他入学？不可能。任他当院长，人家早有好几个人了。他老老实实像他后来执导的处女作《哗变》中的俘虏，站在从未见过的赵玉面前。

赵玉问他答，两人开始写一段让他迄今还能背诵的台词：

“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不是。这字写得够紧张的了，苏联是不是从北边打进来了。”

“是你写的也没关系，我们只是要核实核实。”

何群不得不考虑刚刚从大西北归来的父亲。因为当时著名的漫画家华君武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头头，而且在前几天还问过何群父亲何燕明的政策落实问题；特意关照过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张冰给予尽快地落实。何群不敢再给父亲惹事生非了。但此信又确实不是他写的。他也不明白那个人为什么非要盗用他的名字？想了半天认定是自己的名字笔划少，便于操作的缘故。

紧接着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朱丹、鲁艺时期的革命前辈，接见何群。

何群变成刘姥姥，头一次面对这么多画家名人，并且每个人都对他相当和气，在笨拙和窘态中终于经历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但肯定是最后一世的世面。在不到两年的工夫里，这一批明星先后在中国的上空消失。

朱丹问：“你父亲问题解决了么？”

何群答：“这和他没关和我也没关。”

“你的画不错。”

“我知道自己一般，素描也一般；但我也不是考生中最次的。”

“你承认是你写的吗？没关系，只想核实。”

“我告诉你，既然署名是我，那肯定不是我。”他差点给朱丹上堂福尔摩斯侦探课；问题是他无法征求柯南道尔的同意，加上朱丹要送客，也就免了一次侵犯版权的国际纠纷。

华君武的儿子华方方，和何群是好朋友。但何群已经没有任何摆脱的能力，全世界除了新生的婴儿与白痴，其余的都认定是他写的上告信。他的任何解释和坦诚都将使他越来越走向被动。他越表白自己嫌疑越大。他的一切言语全成了标准的诡辩符号。而他的獐头鼠目造型的脸，便容易让一切有着丰富阶级斗争经验的人一眼识破。

此时，何群被供祭到祭台上，已经不再属于他自己。他不能主宰自己，也不能影响别人，唯一的自由便是任一切国产的厨师煎炒烹炸，然后摆到午门外零售处理。

“你不要怕，你不是揭发吗？”

人生的魔术是永远饶有兴趣地变幻的。现在，又变成了“揭

发”了。当时何群的脸肯定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封面，灰中透着铁青。同时，他被告之十月二日到文化部，还是谈这件事。何群这次知道了“在劫难逃”的滋味与厉害。他没有能力反抗也不敢反抗，如同足球被人不断地踢出场地。他的不幸不在于被人踢来踢去，而在于踢球者的带球冲刺水平太拙劣，临门一脚大都不行，不得不重新开球再踢。无穷反复，把何群弄得竟然从北京的地铁走入天津的下水管道。

十月二日，何群按照一些很难说清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指点，来到沙滩北街2号，整整转了一个小时。门口站着持枪的解放军战士。他不明白一个文化部怎么还要有武装警戒？他怀疑里面是不是SFT型空对空导弹基地。待他从路边缝破鞋的老汉嘴里得知真是文化部时，嘴张得比破鞋还大，要不是走得快，肯定会让老汉用麻绳缝上。他填好只起浪费纸张作用的会客单，把驼背尽量往竖里顺顺，争取到和旗杆一样的水平，便开进了和兵营气氛差不哪去的文化部大院。待他在四十二分钟后出来时，中国大地第一个准仪仗兵便诞生了，只是腿稍稍有点罗圈；当然要是罗斯福和林肯一道访问中国，也因此出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他俩的视力加起来不到1.2——据第三世界灾民们反映。可是何群没有机会进入仪仗队享受这等殊荣，只能借着《大阅兵》的拍摄机会，混进临时组建的冒牌的仪仗队站上两分钟，一待进入实拍，陈凯歌一挥手，何群也就自动出画。

文化部长黄镇因临时有外事任务没有接见他。何群比较理解：肤色再深也是国宾，自己为了国家利益也要做出力所能及的牺牲。接见改动了一下，变成接待。文化部长办公室的秘书，其特征和所有的秘书一样戴眼镜，他接待了何群，态度非常诚恳。当然，这个秘书也不会知道他面对的是六年后把中国电影史改写得错字百出的人中的一个；只知他是写匿名信的人——尽管后面署上“何群”，也认定是匿名信。这种认同和人们认为地球往西转天才黑一

样地错误，但又得到人们的普遍承认。当有十亿人认同一个错误，这个错误马上变成人类的普遍真理。

“你愿不愿上学？”

“愿意。”

“你对这次考试有看法？”

“看法，不能说没有。但这信不是我写的。”

“黄镇部长很关心你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也不管这种关心是什么性质的，何群还是差点流下泪来。从父亲被打成右派，自己的流浪，他对人间温暖已经相当陌生，更多接受的则是歧视和镇压。他不敢奢望亲情，就像不曾敢去想自己也有权力拥有一份阳光一样。关于何群性格中的自卑和怯懦，关于他的善良与胆识，关于他的思维混乱和咬住不放的清醒——这些被不知什么社会力量混和在在一起的矛盾心态，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论述。如果谁不知“自相矛盾”的确切含意是什么，你看何群一眼就全明白了；省了排版工人和小学教师不少麻烦。

十一月十三日，这个被西方人认定不吉利的数字，却给何群带来了难以名状的吉利；耶稣可能考虑到何群毕竟不是犹太，没有必要让他代人受过；于是耶稣的支部就这么决定了：在这一天破例让中国的何群吉利一次。中国文化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和中国教育部一研究，决定扩大招生指标。

这天下午，何燕明接到北京电影学院教务处的电话：“我们经过反复认真研究，决定录取你的儿子何群。”

而此时，已经开学两个月，导演系班的一位同学，已经轻松地在姑娘床上犯了三次错误；而何群还不知美术系的课堂是在厕所的左边还是右边。

何群必须得上学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有关规定，如果接到录取通知书不去报到。将被剥夺两年的报考资格。这两年

对于共和国来说也就等于两秒，但对于共和国下的生命，可能意味着失去终生。

何燕明不得不为儿子面对的环境担心。

母亲也劝何群：别去了，能有你好吗？去了后这学也没法上。

一向自卑和不自信的何群，这次不知是吃了毒品还是扎了吗啡。把底肥不足长得垅短苗细的头发一捋，背往下驼，找个没人的地方五音不全地喊了一阵子《打虎上山》，便像准备挨打的老鼠般地钻进朱辛庄，这个看起来和农村场院差不多的其实是世界电影场院的北京电影学院。有时我想，世界如果设“最不自信奥斯卡奖”，那肯定非何群莫属。任何人也竞争不过他。但这次不知从哪获得如此之巨大的勇气，我估计可能是吃错了药。

当时，一夜之间北京所有的高校院内和教育部威严的墙上，刷出《黄镇利用职权，压制北京电影学院师生》等相同内容的文革遗风的大字报，那时宪法还没有顾上后来删去的这些条款，人们继承传统表达着自己的见解，许多高级干部和宪法长期修改者也云集此处，了解民意体恤民情。

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圣殿与厕所中，同时出现批判黄镇的大小字报。里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何群和张艺谋的名字，但成了何某与张某某。

何群与张艺谋没有任何选择，只有面对天塌般的压力，面对这电影学院各种各样曝光不足的脸，就像他们后来成功时面对曝光过度的脸一样；他们为了自己日后在人生世界上不沦为乞丐，必须像傻瓜一般没有感觉地上课下课。一九八七年，当我和侯咏第一次与张艺谋一桌吃饭时，我不明白张艺谋为何一顿饭没有说一句话，和西北的农民一样不知嘴还有交流感情的作用。命运不知是否存心让电影界一些人不舒服，还是觉得中国电影史太缺少可读性，便在一个早上把何群和张艺谋剪在一条胶片上；后来这条胶片整整绕了地球一周，给中国人上演了一场非常有气势的宽银

幕，从而结束了中国影片是放大的皮影艺术的印象。

张艺谋也因某种原因被从胶片上剪辑掉，当成门帘挂到朱辛庄的公共汽车站牌下，给未来的今村昌平、史提芬·史匹尔博格、阿尔蒙多斯、官川一夫等人遮风避雨。他的悲剧不是别人冒他的名字写上告信。而是不得不自己动手写申诉信，而且附上自己的摄影作品。何群和张艺谋是两种文体一个主题的悲剧。而这两个悲剧的最后结尾出人意料地又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黄镇执笔完成的，可能由于文笔不同，悲剧稍经改动结局便成了音乐舞蹈史诗。在黄镇的干预下，何群与张艺谋双双进入从头到脚都不欢迎他们的北京电影学院。

黄镇的《长征速写》实在不敢奉承，尽管是当年新华书店唯一的一本速写集，尽管许多青年画家都是从这里走向大师，但我仍然不能回避我对它的历史成见；如同我今天不得不承认他对中国电影界做出的卓越贡献。起码，他为五年后第五代的集合力量提前做了兵力部署，且不管是不是自觉的，效果却是这样承认的。如果在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九年这一段时间，没有何群和张艺谋混迹于影坛，可以想像中国影史将会连续出现空白，历史没有一页是平民写成的。不信，你翻开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看看，哪一页是由平民写成的？——那是人杰们的谦虚和托词，而我们则没有必要幼稚地认同。马列主义是尊重事实的。

从此，何群便易名“何某”在北京电影学院苟活了。

后来他在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对面的大排档吃饭时含泪和我说：“你不知道，这四年学我是怎么挺过来的。我没有自信，没有灵魂，连想女人的情绪也没有。这么大的压力，那么多不花钱装了我一床底的小鞋，我快要疯了。我画画手都哆嗦。四年中天天都有控告我的信，我一直生活在大字报下面。那时，院内出现一堆堆人我就发毛，总认为又有新的‘何某’出来了。我从来也没找系主任葛未末谈过。有一次我去打饭，美术系师生又在食堂贴

出驱逐‘何某’的大字报，从那天起，我和你一样变得口吃起来。我不明白，我得罪谁了。”

广州的街头灯红酒绿，大排档的老板过来，我们“买单”。当他从何群的工作证上得知眼前的便是中国电影界精英何群时，把拿到手的钱又甩了回来。“你就是那个何群?! 免了免了。”他拍着何群的肩大喊着，做给满屋的食客看。何群马上变得惊慌失措，不知地北天南，喃喃半天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所有的人拥上来，像看濒于灭绝的珍贵动物似的把何群看个遍；遗憾的是百分之百全系男性公民，没有异性崇拜者。后来，我便成了何群的替身，天天代表何群去这家大排档吃清蒸鱼、沙河粉。帐房老板看在新结识的何群精英的面子上，多少要点钱走走形式，怕伤了酸文人的心。我这个人天生有个病，往外掏钱手直哆嗦，但往里拿钱速度可快呢。这下可成全了我这毛病了。后来一打听，这毛病不但我有，其他人也有。

那一年，何群才刚刚二十一岁。但他必须咬紧牙关，必须把别人打肿的脸当唐朝以肥为美的标准来对待；四年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北京电影学院不是定终生的码头。但是何群错了，他低估了他面前的对手；他像低估自己才气一样，低估着我们这个社会的丑恶。

何群家居北京，不论从哪一点上说，都将在毕业时法定留在京城；但他在被人整了四年后终于聪明起来。他第一志愿理所当然填的是峨嵋，天府之国；第二志愿潇湘；第三志愿广州，思想比较自由的地方。他的毕业歌写得太好了，只是忘记分小节了。而好心的朋友江海洋，后来的《少爷的磨难》、《匿名电话》的导演，马上警告何群：你不能白白放弃留京机会，这是你天生的权力。何群在江海洋的唆使下，上街买了一滴灵将钢笔墨水涂掉，将第一志愿改成：北京，老子系皇城根下的人；第二志愿：峨嵋，吃喝不愁的地方；第三：广州，女人和金钱并列的土地。他的导演水